政治科學論叢／第 84 期／民國 109 年 6 月／頁 39-70

後蘇聯國家對外經貿關係選擇的研究：以烏克蘭爲例*

況正吉**

摘　要

蘇聯解體之後，原蘇聯地區內出現了獨立國協、歐亞經濟共同體、歐亞經濟聯盟等多個整合組織，但各成員國立場分歧，使得統合進程緩慢。獨立國協國家作爲俄羅斯的傳統勢力範圍與緩衝地區，對於俄羅斯的地區安全穩定和經濟發展有著重要意義。另一方面，隨著歐洲聯盟向東擴大，推出東部夥伴計畫，歐盟企圖影響後蘇聯國家，並且擠壓到俄羅斯的地緣戰略空間。

烏克蘭危機之後，親歐派的政治力量處於壓倒性的地位，烏克蘭選擇歐盟並與俄國對抗，但受制於俄羅斯，國內經濟未有好轉，加入歐盟也沒重大進展。2019 年烏克蘭新總統澤倫斯基（Володимир Зеленський）的崛起，即是烏國民眾對於傳統政治人物的不滿。本文經由烏克蘭的個案研究發現，烏國在面臨俄羅斯與歐盟兩強的格局下，同時身處於利害交錯不定的國際情勢時，會實施避險策略。但大國（俄羅斯）若是無法容忍，且要求選邊站的情況下，小國（烏克蘭）便只能在親歐和親俄間擇一，避險的對外政策則無法持續進行。

關鍵詞：避險策略、歐亞經濟聯盟、歐盟、澤倫斯基

---

* DOI:10.6166/TJPS.202006_(84).0002
本文亦要感謝兩名匿名審查委員的多項修正意見，以及編輯委員會委員的寶貴建議，使得整篇文章得以完整地表達作者的觀點。

** 大葉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兼任助理教授，E-mail: cckuang@mail.dyu.edu.tw。

收稿日期：108 年 11 月 15 日；通過日期：109 年 6 月 22 日

臺灣大學政治學期刊資料庫

壹、緒論

1989 年東歐民主化至 1991 年「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Сою́з Сове́тских Социалисти́ческих Респу́блик, СССР）的解體，這短短的幾年間，中東歐與原蘇聯地區的共產主義國家迅速崩潰，取而代之的是西方的民主制度。三十多年下來，這些國家皆經歷了數次的國會選舉，部份國家的經濟改革也頗具一定的成效。後蘇聯國家進行民主轉型，除了意指政治層面，也包含了經濟層面，亦即經濟的市場化的「雙重化轉型」（dual-transition）（Nitoiu, 2018: 685）。民主化轉型除了包括政治體制下自由民主的建立，也包括建立自由的市場經濟體制。

1990 年代由於東歐國家在共產政權解體之後，相繼採行了西方的憲政制度，「總統制」（presidential system）、「內閣制」（parliamentary system）或「半總統制」（semi-presidential system）（Duverger, 1980: 165-187；Shugart & Carey, 1992）；在經濟上，社會主義的公有制、計劃經濟體制皆被私有制、市場經濟體制所取代。過去是「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的加盟共和國，在「蘇聯」解體之後，加盟國紛紛獨立。部分的後蘇聯國家在民主化過程中，企圖擺脫了四十多年「蘇維埃化」的烙印，建立了西方式的民主制度以及自由市場經濟制度，同時逐步朝向「歐洲聯盟」（European Union, EU）整合的目標邁進（Schenider, 2009），烏克蘭便是其中之一的國家。

筆者選擇烏克蘭進行個案研究，主要是因爲該國面對歐盟與俄羅斯雙重影響的國際格局，與其他後蘇聯國家的國際情勢相似，烏克蘭選擇與歐盟持續發展單邊關係，正可提供部分後蘇聯國家（夾在兩強權間的小國）對外經貿關係選擇的參考，同時透過個案的分析，尋找到一個有效的解釋定律，並期望能夠在比較政治領域中產生創見，填補國內外學術研究這方面的空缺。在烏克蘭案例的研究分析上，筆者採用「避險」（hedging）策略加以分析，[1] 因爲在 2013～2014 年危機爆發之前，烏國在親俄與親歐間擺盪。

[1] 「避險」（hedging）一詞源自於外匯操作與金融投資的概念，目的是在於避免全盤皆輸的情況出現，近年來部分學者將避險的概念引入國際關係的研究，經常被用來解釋

臺灣人文社會期刊資料庫

過去，烏克蘭的對外政策遊走在「抗衡」（balancing）和「扈從」（bandwagoning）之間的不穩定狀態，以及國內親歐派政黨與親俄派政黨的政治角力，再加上面臨與他國的利益衝突，使得國家在對外關係上採取避險策略。

烏克蘭危機爆發之後，烏俄雙方有克里米亞領土的紛爭以及烏東地區的軍事衝突，已無法再採取避險的外交戰略，面對俄國只能改採行傳統的抗衡戰略。對於其它後蘇聯國家而言，同樣也需面對歐盟與俄羅斯兩強權的局面下，而做出抉擇，筆者藉由烏克蘭的案例與其它後蘇聯國家的對比分析，期望找出一個定律，針對後蘇聯國家對外政策的選擇能夠提出合理的解釋分析，尤其對於目前正採行避險策略的摩爾多瓦，將具有參考借鏡的價值。除此之外，未來後續研究可以將區域的研究範圍，從原蘇聯地區國家擴展到中東歐國家，涵蓋整個歐亞地區的後共產主義國家，這對於比較政治的研究領域，將會有些許的貢獻。

在國際關係領域中，一些代表性的避險研究文獻如下：意大利學者菲奧里（Antonio Fiori）和帕塞西（Andrea Passeri）把避險看成是抗衡與扈從之間的「中間立場」（middle position）（2015：685），但也有學者認爲，國家採取避險的對外政策時，並非是選擇中間立場，而是同時採行相反的立場；美國學者魏茲曼（Patricia A. Weitsman）運用「避險聯盟」（hedging alliance）的觀點，來詮釋小國在面臨外在安全威脅時，會採取一種混合式的對外政策，一方面和威脅的國家進行交往互動，另一方面則尋求加強與其他國家或國際組織的關係，目的是牽制威脅的國家（2004：11-37）；澳洲學者吳翠玲（Evelyn Goh）認爲東南亞國家面對不穩定的區域秩序，採取的避險方式有數種：首先是說服大國（美國）對中國大陸實行平衡戰略，其次是對於中國進行複合型的接觸，最後則是以東協爲主導的區域性國際

國家對外行爲兩邊下注的作法，國際關係學者將避險視爲抗衡與扈從之外第三種對外行爲策略。由於資訊的有限，無法讓小國清楚掌握自身的國家利益所在，因此選擇抗衡或扈從，都將面臨選錯邊的風險。所以，有學者認爲抗衡或扈從只能做爲一個長遠的戰略目標，對於小國來說，短期內應當採取避險策略，才能確保本身最大的利益。去，原蘇聯地區的國家，經濟發展程序愈高、愈和西方親近的國家，愈容易對莫斯科採取抗衡的政策；而經濟發展程度愈低、愈和西方疏遠的國家，則愈容易採取扈從的政策（吳玉山，1997a：1-32；1997b：61-80）。

臺灣大學政治學系

組織來約束區域性大國的策略（2005：1-46）；馬來西亞學者郭清水（Kuik Cheng-Chwee）運用避險策略來分析馬來西亞和新加坡對中國的外交政策，他認爲避險是指國家在利益交錯與高度的情勢不確定之下，採取多元的策略，以謀求達到互相抵銷的作用（2008：163）。他在東協國家對華行爲研究中指出，採取避險必須具備三個政策元素：(1) 拒絕選擇一邊站，不加入大國或其他國家任何一方的陣營；(2) 採取一些目標相互對立、影響互相抵消的政策；(3) 在對外政策與立場上，始終爲自身留下「退路」（fallback position）（2016：500-514）。

國際關係學界目前對於避險的討論還在持續進行，有待更多不同的個案研究，才能夠進行修正和補充。迄今爲止，學術界尚未發展出關於國際關係中「避險」行爲的普遍性理論框架，本文透過烏克蘭的個案研究，以及與其他後蘇聯國家對外經貿關係的對比分析，累積不同的個案研究，期待有更新的發現與補充。

貳、歐盟與俄羅斯對後蘇聯國家之政策

後蘇聯國家一直受到歐盟與俄羅斯的影響，多年以來俄羅斯對於原蘇聯地區懷有重新整合的強烈慾望。歐洲聯盟倡議的「東部夥伴關係」（East Partnership, EaP）計畫與俄羅斯推動的「歐亞整合」（Eurasian integration）對於後蘇聯國家，都具有相當程度的磁吸力（Vieira, 2016: 566-567）。下面我們將從歐盟和俄羅斯對於後蘇聯國家的影響分別進行剖析：

一、歐盟的政策

歐盟在經濟上對於後蘇聯國家具有強大的吸引力，藉由提供援助金額的外部誘因，假使這些國家如要取得經濟援助，須滿足歐洲聯盟的附加條件，經濟援助的附加條件通常是國家內部需要改善民主條件，同時經由「聯繫國協議」（Association Agreement, AA）的簽訂，再透過制度性約束，來加快這些國家民主政治發展的腳步。愛沙尼亞、拉脫維亞和立陶宛的經濟發展道路就是選擇加入歐洲聯盟的經濟整合，接受歐盟的「法爾計畫」（PHARE Programme）與「塔西斯計畫」（Technical Assistance for the Commonwealth

臺灣大學圖書館期刊資料庫

of Independent States, TACIS）的經濟援助等，[2] 並經由聯繫國協議的簽署，完成加入歐盟談判。2004 年東歐國家（包括了原蘇聯地區的立陶宛、愛沙尼亞與拉脫維亞）加入歐盟，這使得歐盟出現新的東方鄰國（例如：烏克蘭、摩爾多瓦等國家），爲了避免在歐洲內部形成新的分裂線，並促進歐盟內部及其周邊區域的繁榮。因此，歐盟提出了一個新的計畫，即「歐洲睦鄰政策」（European Neighborhood Policy, ENP）。[3] 歐洲睦鄰政策是尋求將歐盟以東與以南的國家與歐盟結合，這些國家主要是後蘇聯國家，而且涵蓋了地中海周邊的國家（Wilson, 2014: 13），這些國家的目標是尋求加入歐盟或尋求與歐盟經濟更緊密結合。歐洲睦鄰政策的夥伴國家只要符合政治改革、經濟改革和其他正面改革的嚴格條件，歐盟就會向他們提供經濟援助。

這個過程由「行動計劃」（action plan）所支撐，歐盟以協議來換取歐洲睦鄰政策的夥伴國對政治、經濟、貿易及人權改革的承諾，並且享有對歐盟市場（工業產品、農產品等）的免關稅待遇、財政及技術支援。但是「歐洲睦鄰政策」並不承諾向夥伴國提供加入歐盟的前景，導致這些國家參與以及執行該計畫的意願嚴重受挫。歐盟日益意識到通過該計畫無法有效推進後蘇聯國家的區域整合，在此背景下，歐盟針對後蘇聯國家於 2008 年提出了一個新的政策倡議，即歐盟的「東部夥伴關係」（EaP）計畫（Nielsen & Vilson, 2014: 243-262）。[4] 東部夥伴關係計畫，它是一項由歐盟發起處理

---

2 「法爾計畫」主要是針對中東歐國家由計畫經濟轉型至市場經濟的過程中，給予必要的協助與貸款。該計畫具有下列數項目標：(1) 維持現有的貨品與勞務輸出所需之設備，並且滿足農業輸入品的外匯需求；(2) 提供專業知識與財經上的援助，以利於建構市場化導向的商業部門；(3) 協助農業與工業環境部門的發展計畫等。「塔西斯計畫」係 1991 年歐洲執委會所提出，目的爲提供後蘇聯國家，但是波羅地海三國除外，總計 12 個國家的財政技術援助，這些國家分別爲：亞美尼亞、亞塞拜然、白俄羅斯、喬治亞、哈薩克、吉爾吉斯、摩達維爾、俄羅斯、塔吉克、土庫曼、烏克蘭和烏茲別克（Mayhew, 1998: 138-145）。

3 歐洲睦鄰政策（ENP）是把歐洲周邊十幾個鄰近國家與巴勒斯坦地區的配套政治和經濟改革，促進和平，穩定和經濟繁榮整個地區的一種手段。這些鄰近國家別爲：白俄羅斯、摩爾多瓦、俄羅斯、烏克蘭、亞美尼亞、亞塞拜然、喬治亞、阿爾及利亞、埃及、以色列、約旦、黎巴嫩、利比亞、摩洛哥、敘利亞、與突尼西亞。

4 「東部夥伴關係宣言」是由歐盟 27 國與 6 個後蘇聯國家的政府首腦或部長在 2009 年 5 月簽署，之後東部夥伴關係計畫正式宣告開始。6 個後蘇聯國家分別爲：喬治亞、烏

臺灣人文社會期刊資料庫

歐盟國家和後蘇聯國家的計畫如：亞美尼亞、亞塞拜然、喬治亞、烏克蘭、摩爾多瓦和白俄羅斯。此計畫是爲歐盟國家和後蘇聯國家間建立談判貿易與經濟戰略，重要目的就是要在政治、經濟、社會等各領域逐一對這些國家進行「歐盟化改造」，提高這些國家在政治經濟等方面融入歐盟的程度，並且推動民主化進程，以此確保歐盟東部邊界的穩定、安全與繁榮。

「東部夥伴關係」計畫與「歐洲睦鄰政策」一樣，並未給予夥伴國家歐盟成員國的地位，而只承諾促進彼此之間的關係。在歐盟東部夥伴關係計畫的構想當中，與夥伴國家簽署「聯繫國協議」是其中的一個重要環結，而聯繫協議的核心在於簽署「深入與全面的自由貿易協定」（Deep & Comprehensive Free Trade Area, DCFTA），夥伴國簽署了該協定，將能有效進入歐盟的內部市場。另外，「歐洲睦鄰工具」（European Neighborhood Instrument, ENI）生效於 2014 年，這是「歐洲睦鄰政策」的財務手臂，在歐盟的對鄰國向東方和南方的外交政策，並提供了大量通過一些項目提供資金。歐洲睦鄰工具的六大目標中第一項即是促進人權和基本自由、平等、可持續的民主、善治和繁榮的公民社會，[5] 同時對於歐盟的鄰近威權體制國家，可以提供經濟上的利誘，加強與歐盟的經貿連結，更進一步有助於推動國內政治的民主轉型。

二、俄羅斯的政策

在後蘇聯的空間區域中，俄羅斯企圖維持或重新建立傳統，雖然俄國與歐盟在原蘇聯地區的穩定上具有共同的利益，但是自從歐盟推出一系列的政策之後，像是東部夥伴關係計畫等，使得在原蘇聯地區逐漸浮現出歐盟與俄羅斯的競爭態勢。由於原蘇聯地區的外高加索與中亞國家過去在冷戰

---

5 克蘭、白俄羅斯、亞美尼亞、摩爾多瓦和亞塞拜然（Гаман-Голутвина et al., 2014: 20）。「歐洲睦鄰工具」（ENI）它是建立在過去 2007 年至 2013 年「歐盟睦鄰與夥伴工具」（ENPI）的成就上發展而成的，「歐洲睦鄰工具」將於 2014 年至 2020 年之間提供 15.4 億歐元的經濟援助，同時力求精簡財政支持，主要集中在商定的政策目標，使之更爲有效。援助的國家扣除俄羅斯之外，爲歐洲睦鄰政策剩下的十五國與巴勒斯坦地區。由於俄羅斯有著特殊的地位，歐盟與俄國是屬於戰略合作夥伴關係，不屬於歐洲睦鄰工具的夥伴國家。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時期爲蘇聯的加盟共和國，因此產業結構失衡、經濟體質較差，即使是其原料供應優勢產業亦受地理運輸條件所限制，目前仍然無法在國際市場中佔有一席之地，僅能尋求區域經濟合作。重新建立與過去蘇聯時期計畫經濟制度下的經濟聯繫，恢復和現今「獨立國協」（Содружество Независимых Государств, СНГ）國家的經貿往來關係，正是俄羅斯當前積極努力的方向，透過區域經濟的合作，以發揮經濟上的影響力（Matveeva, 2018: 720-721）。

早在 2003 年 9 月，獨立國協中經濟規模最大的俄羅斯、烏克蘭、哈薩克和白俄羅斯四國首腦正式簽署了「組建統一經濟空間的構想和協定」，期望達成建立「共同經濟空間」（Общее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е пространство）的長遠目標，其基礎是將制度整合轉型到「四項自由」（商品、服務、資本、勞力）原則的實施。[6]「歐亞經濟共同體」（Евразийское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е сообщество, ЕврАзЭС）運作了幾年之後，俄羅斯於 2007 年 10 月與白俄羅斯以及哈薩克三國簽署了新的「關稅同盟條約」（Комиссия Таможенного союза），之後在 2009 年簽署了「關稅同盟海關法」，俄哈白三國「關稅同盟」（Customs Union）正式成立，快速朝向更緊密的經貿整合目標邁進。從 2010 年 1 月起，俄羅斯、哈薩克和白俄羅斯正式實行統一的關稅稅率、關稅限額使用機制、優惠和特惠體系等。

加強獨立國協國家的經濟整合，一直是俄羅斯努力的目標。2011 年 10 月，當時俄羅斯總理「普京」（Владимир Путин）在俄國著名的《消息報》（*Известия*）上發表了有關未來歐亞統合新方案的署名文章，他對未來的歐亞聯盟進行了勾畫，即以俄羅斯、白俄羅斯、哈薩克三國關稅同盟爲基礎建立「歐亞經濟聯盟」（Евразийский экономический союз, ЕАЭС），隨後建立集政治、經濟和軍事等層面爲一體的國際組織 —「歐亞聯盟」（Евразийский союз）。[7] 普京在文章中表示，希望把「歐亞聯盟」打造成

---

6 「共同經濟空間」（Common Economic Space, CES）是聯合白俄羅斯、哈薩克、俄羅斯、烏克蘭四國的經濟空間。在共同經濟空間框架之下，經濟調節機制應當建立在統一的原則基礎之上，建立在促進商品、服務、資本和勞動力自由流動的原則，嚴格執行統一的對外貿易政策、統一的稅務、貨幣信貸和財政金融政策。

7 按照普京在文章中的表述，我們可以歸納出，他所勾畫的歐亞聯盟主要包括以下幾方面的內容：第一，歐亞聯盟以各國共同利益和互利共贏爲原則，是建立在新的政治、

臺灣大學政治學系資料庫

世界格局中新的重要角色，發揮其作爲支撐歐洲和亞太地區橋樑的作用。下表爲俄羅斯近二十年來推動歐亞區域整合的進程，從早期的經濟共同體發展至關稅同盟，到更進一步推進到共同經濟空間和歐亞經濟聯盟：

表 1 俄羅斯推動歐亞區域整合的進程

<table>
<tr><td rowspan="3">2000-2007 年</td><td rowspan="2">2007-2011 年</td><td rowspan="2">2011-2014 年</td><td>2014-年</td></tr>
<tr><td>歐亞經濟聯盟</td></tr>
<tr><td colspan="2">共同經濟空間</td></tr>
<tr><td colspan="3">關 稅 同 盟</td></tr>
<tr><td colspan="4">歐 亞 經 濟 共 同 體</td></tr>
</table>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2014 年 5 月，俄羅斯、哈薩克和白俄羅斯三國總統在哈薩克首都「阿斯塔納」（Астана）舉行的「歐亞經濟共同體」會議上，正式簽署了「歐亞經濟聯盟協定」（Договор о Евразийском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м союзе）。「歐亞經濟聯」盟承繼俄哈白三國關稅同盟相關規定，邁向更進一步區域整合，讓貨品、服務、資金與勞動力能在區域內自由流通（Roberts & Moshes, 2016: 543-545）。俄國還努力爭取其他獨立國協國家加入，2014 年 10 月俄羅斯在「明斯克」（Минск）簽署了接受亞美尼亞加入歐亞經濟聯盟的協定，同年 12 月吉爾吉斯簽署了加入歐亞經濟聯盟的協議。

歐盟東擴之後，一直試圖把後蘇聯國家納入自己的影響範圍，進而擠壓俄羅斯的戰略空間，「歐亞經濟聯盟」的建立使搖擺不定的亞美尼亞轉向參與俄羅斯的區域整合。但因烏克蘭危機而激化了俄羅斯與西方的對立，西方國家聯合對俄羅斯實施的經濟制裁，對俄羅斯的經濟造成了嚴重的衝擊，同時也影響了俄羅斯整合原蘇聯地區的政經實力。

經濟以及新的價值觀基礎之上。關稅同盟和統一經濟空間是推進歐亞整合進程的核心，歐亞聯盟是最終目標。第二，歐亞聯盟是一個超國家組織，未來將成爲世界格局中新的重要角色，同時發揮它作爲歐洲和亞太地區之間的橋樑作用。第三，歐亞聯盟是一個開放性的組織，遵循平等、主權和自願的原則。

臺灣人文學期刊資料庫

三、近期歐盟與俄羅斯對烏克蘭的政策措施

歐盟對烏克蘭提供經濟上的誘因，透過經濟援助，拉近雙方關係。烏克蘭親歐盟示威運動爆發後，歐盟提供烏克蘭的發展援助（2014 年至 2020 年包含歐烏雙邊援助行動計畫、睦鄰夥伴投資架構、共同外交與安全政策等對烏國的贈予）、歐盟財政制度（包含歐洲中央銀行與歐洲復興暨開發銀行）等總合約 111.75 億歐元（楊三億，2018：19）。此外，歐盟與烏克蘭簽署「聯繫國協議」及「深入與全面的自由貿易協定」來強化雙邊關係。相對於歐盟而言，俄羅斯對烏克蘭提供的誘因則較爲多元，除了雙方的貿易活動外，尚有能源（天然氣）的互動。另外，俄羅斯主導的「歐亞經濟聯盟」（EEC）出現前，原先是提供烏克蘭共同對外關稅與「共同經濟空間」的整合選項，惟烏克蘭於橙色革命後推遲與俄國整合步伐（楊三億，2018：20），2010 年親俄派總統上台之後申請加入，但也因 2013-2014 年烏克蘭危機而終止。簡言之，2014 年 2 月廣場革命後，歐盟對烏國的援助逐漸加大，使烏克蘭成爲東部夥伴受援國家之冠：相反地，俄羅斯則是對烏克蘭實施經濟制裁，盧布貶值，國內整體經濟衰退（Миронов, 2015: 5-7）。但在天然氣方面，2019 年 12 月在歐盟和德國的斡旋下，俄烏達成新天然氣輸送合約協議。

參、烏克蘭的內部政治與對外經貿發展

蘇聯解體烏克蘭獨立之後，西烏克蘭與東烏克蘭卻有著不同的傾向與差異，西部居民希望加入歐盟；東部居民則主張與俄羅斯維持親密關係，這種分裂導致雙方之間難以達成共識，容易出現衝突（Shulman, 2004: 35-56）。在 2010 年之前烏克蘭推行結盟外交，期望加入歐盟和北約，以抵抗俄國的覬覦，而俄羅斯則是以經濟手段來干預烏國內政，並拉攏兩國間的關係。烏克蘭的對外政策當時是採取「避險」策略，面對俄羅斯的威脅，爲了避免在抗衡和扈從選項間做出抉擇，並試圖維護本國的安全和利益。2010 年親俄派總統上台之後，仍舊維持避險的對外策略，亞努科維奇（Віктор Янукович）總統企圖改善與俄國的關係，放棄加入北約，尤其在

臺灣人文與社會科學引文索引

黑海艦隊的問題上，烏俄雙方達成共識並簽署協議，烏克蘭同意俄羅斯黑海艦隊駐烏克蘭「塞凡堡」（Севастополь）海軍基地期限延長 25 年，一直到 2042 年才終止。塞凡堡位於克里米亞半島西南方，是俄羅斯黑海艦隊的主要駐紮點，這項協議的簽署鞏固了俄羅斯在烏克蘭的軍事存在。但 2014 年烏克蘭親俄派總統被趕下台後，塞凡堡海軍基地期限延長協議即將遭到終止，失去了塞凡堡等於放棄了黑海的控制權，並且喪失了從亞速海經黑海和地中海通往大西洋的航道，嚴重傷害到俄羅斯的國家利益。因此，基於軍事戰略的考量，俄國立即改變過去採取經濟合作的對外策略，採行對外武力兼併的措施，以武裝軍事力量接管克里米亞半島。以下將分別從內部政治發展與對外經貿發展的層面，來進行探討分析。

一、內部政治發展

烏克蘭獨立之後基本上是和其他多數的後蘇聯國家和中東歐國家一樣，實施「半總統制」的政府體制（Kuzio, 2018: 344）。1996 年烏克蘭制定了第一部憲法，採行「總統－議會制」（權力偏向總統的半總統制）（Yan, 2018: 272），並進行國會選舉，烏國雖然有選舉，但是政治的反對派勢力薄弱，權力掌握在諸多「寡頭」（oligarchy）的手中。[8] 這些寡頭之間相互勾結時，各行業的產量由各寡頭協商確定，同時寡頭壟斷市場上的價格，通常由各寡頭相互協調的行爲方式所決定。烏克蘭的寡頭們先是控制了國家的經濟資源，然後，他們又逐漸捲入政治，有時候尋找代理人，有時候乾脆自己進入政府，成爲議員和高級官員。

2004 年「橘色革命」（Orange Revolution）爆發之後，[9] 親歐派的「尤

---

8 一種由少數賣方（寡頭）主導市場的市場狀態。英語中這個詞來源於希臘語中「很少的賣者」。寡頭壟斷行業往往是生產高度集中的行業，例如：鋼鐵、天然氣、石油等行業。它的顯著特點是少數幾家廠商壟斷了某一行業的市場，這些廠商的產量占全行業總產量中很高的比例，從而控制著該行業的產品供給。寡頭壟斷的市場結構中，由少數幾個企業在市場中佔有很大的比例。獨立後的烏克蘭，政府不得不是某種形式上模仿西歐或者美國模式的憲政政府，於是每個寡頭集團都建立自己的政黨。寡頭集團還操縱著全國的媒體系統，主要的報紙、電視台等傳媒機構都由他們控股，每個寡頭集團都有足夠的能力影響政治。

9 「橘色革命」這個運動的標誌是橙絲帶和一面書有 Так! Ющенко!（「對！尤申科！」）

臺灣人文與學術期刊資料庫

申科」（Віктор Ющенко）當選總統，支持前總統「庫奇馬」（Леонід Кучма）的國會議員在國會中提出修憲案，試圖透過削弱未來的總統職權，避免未來親歐派的尤申科當選後會擴大勢力，政府體制改採「總理－總統制」（權力偏向議會的半總統制）。可是，到了2010年親俄派的「亞努科維奇」當選總統，立即宣布 2004 年的憲法修正案違憲，廢止憲法修正案，又將政府體制改回「總統－議會制」（權力偏向總統的半總統制）。之後 2012 年議會選舉，親俄的「地區黨」（Партія регіонів）掌握了議會多數，行政和立法權爲親俄派所掌控。2014 年「烏克蘭危機」爆發，爲了要約束總統的權力，防止擴權，亞努科維奇總統與親歐派簽署協議，再次讓烏克蘭憲法回到 2004 年時期的內容，政府體制又再次改回採行「總理－總統制」（權力偏向議會的半總統制）（Matsiyevsky, 2018: 352）。隨著親歐派與親俄派政治力量的消長轉變，過去烏克蘭的政府體制一直在「總理－總統制」與「總統－議會制」來回變動（Stykow, 2019: 125），贏得總統職位的政治菁英，會以親歐親俄路線爲其展現。綜合上述，筆者整理過去政府體制的變動與歷任總統親歐與親俄政策的轉變，請參閱表 2。

2005 年 1 月「橙色革命」爆發之後，親歐派總統尤申科上台，加速改善與歐盟的關係，先前擔任反對派領袖時便提出了一些計劃，像是烏克蘭與歐盟成爲聯繫國、烏克蘭正式加入歐盟等（Kuzio, 2013: 231）。2005 年 12 月在基輔舉行的第九屆烏克蘭－歐盟峰會中，歐盟公開表示支持烏克蘭加入歐洲聯盟。會後公告上，烏歐雙方確認將有一個新的協議來代替原先的「夥伴關係與合作協議」（The Partnership & Cooperation Agreements, PCAs）。

的旗幟，是指 2004 年至 2005 年圍繞 2004 年烏克蘭總統大選過程中由於嚴重貪污、影響選民和直接進行選舉舞弊所導致的在烏克蘭全國所發生的一系列抗議和政治事件。在 2004 年 10 月的烏克蘭總統大選中由於沒有任何候選人達到法律規定的 50% 的多數，因此在同年 11 月 21 日在得票最多的兩名候選人尤申科和亞努科維奇之間舉行重選。但是，眾多烏克蘭國內外觀察員報導說官方宣布的亞努科維奇獲勝的結果是舞弊導致的，這個選舉舞弊導致了這場抗議。尤申科的選舉活動中使用橙色作爲其代表色，因此這場政治運動使用橙色作爲抗議的顏色。選舉結果被公布後上百萬抗議者聚集在烏克蘭首都基輔的市中心獨立廣場，尤申科的支持者在烏克蘭全國爆發了一系列由反對派組織的抗議、靜坐、大罷工等事件，烏克蘭最高法院宣布這次重選的結果無效，並規定在同年年底重選，結果尤申科獲勝（洪美蘭，2008：149-196）。

臺灣人文社會期刊資料庫

表 2 烏克蘭政府體制與總統對歐俄政策的變動

	1996-2004 年	2004-2010 年	2010-2014 年	2014-2019 年
烏克蘭	（總統－議會制）	（總理－總統制）	（總統－議會制）	（總理－總統制）
	庫奇馬總統（親俄政策）	尤申科總統（親歐政策）	亞努科維奇總統（親俄政策）	波羅申科總統（親歐政策）
	半 總 統 制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幾年之後，在 2008 年巴黎舉行的第 12 屆烏克蘭－歐盟峰會上，烏克蘭與歐盟開始展開「聯繫國協定」的談判。2009 年歐盟更公布了「聯繫國議程」（Association Agenda），加快未來「聯繫國協定」簽署。

但 2013 年 11 月政策出現重大轉變，親俄派總統亞努科維奇突然宣佈暫停與歐盟簽署「聯繫國協定」及「深化與全面的自由貿易協定」，原因是烏克蘭受到俄國的外在壓力，改變原先計畫與歐盟簽署協定，轉向尋求與俄羅斯更緊密的政經合作。這個突然轉變的行動即是突顯出烏克蘭夾雜在歐盟與俄羅斯之間，外在壓力與烏國內在動作的互構與掙扎。此後，支持加入歐盟的烏克蘭人開始在基輔「獨立廣場」（Майдан Незалежності）等地舉行大規模的抗議活動，烏克蘭危機爆發，東部兩州部分區域進入戰爭狀態（Kozachenko, 2019: 1-2）。與此同時，俄羅斯藉由派兵進駐和公民投票，促使「克里米亞」（Крим）脫離烏克蘭，[10] 重新回歸俄羅斯。

[10] 烏克蘭南部的克里米亞半島，過去是屬於蘇聯俄羅斯共和國，直到 1954 年，蘇聯總書記赫魯曉夫（Никита Хрущёв）決定將克里米亞贈與蘇聯的烏克蘭共和國，但半島上大部分居民是俄羅斯族人。蘇聯解體後，克里米亞半島成爲烏克蘭的一部份，許多半島居民對此不滿，島上還駐有俄羅斯海軍的黑海艦隊，當時情況相當緊張，有爆發戰爭的可能。1992 年 5 月 5 日克里米亞半島宣布獨立，後來在俄羅斯的調解下決定成爲烏克蘭的一個自治共和國。2014 年 3 月 16 日，克里米亞歸屬公投結果以 97% 贊成的得票率獲得通過，克里米亞自治共和國正式宣布和「塞凡堡」（Севастополь）市一起脫離烏克蘭，成立新的克里米亞共和國，準備加入俄羅斯聯邦。2014 年 3 月，聯合國以投票表決的方式，認定克里米亞舉行的脫離烏克蘭加入俄羅斯的全民公投，違反國際法，是一次不合法的投票活動。

臺灣人文學術期刊資料庫

(一) 烏克蘭危機

2010 年親俄派總統亞努科維奇上台，他採取一種混合制衡與合作意涵的「避險」策略，一方面設法改善與潛在威脅國家（俄羅斯）的關係，並強化雙方的互動往來，另一方面不放棄簽署「聯繫國協議」，尋求加強與歐盟的關係，滿足西部民眾的要求，同時藉以牽制俄國（Kudelia, 2014: 26-27）。但俄羅斯基於地緣戰略考量，無法接受烏克蘭與歐盟簽署聯繫國協議，因爲沒有烏克蘭的歐亞聯盟，等於缺少了歐洲元素，再加上克里米亞半島上的塞凡堡海軍基地的戰略重要性。因此，施壓親俄派的亞努科維奇總統，隨即他的政策急轉彎，宣佈暫停與歐盟簽署協定，轉而尋求與俄羅斯更緊密地合作。這個決策打擊了許多烏克蘭人希望在加入歐盟之後過上舒適生活的願望，抗議者不僅在基輔的「獨立廣場」上聚集，而且還圍困和衝擊總統府、政府大樓及議會大廈（Ryabchuk, 2014: 127-134），要求政府下台並且提前舉行總統大選和議會選舉。

由於國內外的壓力，亞努科維奇總統在 2014 年 2 月與反對派簽署和解協定。亞努科維奇完全滿足了反對派全部要求：答應組建聯合政府、對憲法進行改革恢復「總理－總統制」、2014 年進行總統選舉。在反對派得勢的情況下，總統所屬的政黨（地區黨）有三十多位議員退出議員黨團，議會力量發生變化。由於議會權力結構產生改變，「全烏克蘭聯盟『祖國』」（Батьківщина）的「圖奇諾夫」（Олександр Турчинов）當選爲議長，親歐派政治力量掌握了議會多數（Мациевский, 2018: 99-100），結果國會以過半數票贊成的決議，罷免了亞努科維奇前總統的職位，反對派領導人圖奇諾夫代行總統職權。

原定 2015 年 3 月舉行烏克蘭總統選舉，經由 2013 至 2014 年的烏克蘭危機之後，總統選舉日期提前，烏克蘭總統選舉於 2014 年 5 月 25 日提前改選，改選的結果烏克蘭的巧克力大王「波羅申科」（Петро Порошенко）第一輪投票就拿到 54.7% 的選票，當選烏克蘭總統（D’Anieri, 2019: 94）。同年國會選舉，烏克蘭西部的一些親歐派政黨快速地崛起，像是「自力更生黨」（Партія “Об’єднання Самопоміч”）、「波羅申科聯盟」（Блок Петра Порошенко «Солидарность»）與「人民陣線」（Народный фронт）等，人民陣線受到西

臺灣人文與社會科學期刊資料庫

部選民的支持，並成爲烏克蘭國會的第一大政黨（Herron et al., 2019: 51）。

自從 2014 年「烏克蘭危機」爆發之後，烏克蘭的政壇發生了重大的轉變，過去「親歐派」與「親俄派」兩大陣營勢均力敵的情況已經被打破，「親歐派」的政治力量處於壓倒性的優勢地位，反俄成爲政治正確，同時對俄關係上，採取「抗衡」的策略。波羅申科總統在任的 5 年期間，國會親歐派政黨掌握議會多數，但烏克蘭的領土問題、寡頭政治、民生等領域的問題依然無解。此外，2014 年競選時所承諾的烏東「頓巴斯」（Донбас）地區實現和平、加入歐盟與俄國合作等目標皆無兌現，導致選民對波羅申科感到失望，總統連任選舉落敗，反讓政治素人「澤倫斯基」當選烏克蘭新總統。澤倫斯基的成功反映出烏克蘭人民對過去所謂傳統政治精英的不滿，他們未能振興經濟、掃除貪污，也無法結束烏克蘭東部分離主義的軍事衝突。

(二) 2019 年烏克蘭新總統與新國會

2019 年烏克蘭總統重新改選，烏克蘭選民將選票投給一位「政治素人」（amateur politician）。[11] 澤倫斯基沒有與任何政黨合作的政治人物，竟然在總統選舉第二輪中以 73% 的得票率當選，這在原蘇聯地區的國家來說，是一個特殊的個案。澤倫斯基的選舉以打破傳統爲宗旨，參與競選以來沒有激動的演說造勢，也沒有拉票，只有選前售票音樂會，甚至以自己沒有任何強烈政治信念爲榮。除此之外，他也沒有提出選民最期待的實際政見，他堅信如果自己沒有向選民許下任何承諾，就不會令任何人失望。過去後蘇聯國家的領導人一般都是出於蘇聯時期的官僚體系，或者是本身掌控利益集團的寡頭，澤倫斯基皆不屬於這兩種類型的人士，而是一位出身演藝界的政壇新人。[12] 澤倫斯基在全國的得票分布打破了過去以往的政治版圖

---

11 政治素人是指沒有從政經驗參與選舉的候選人。政治素人並不是一般意義上的一名不聞，他們在傳統政治領域以外的其他領域，擁有較高的社會知名度，同時在公共政策問題上，採取實用主義立場，反對菁英政治，反對傳統的意識形態。

12 澤倫斯基爲烏克蘭的演員，他在過去幾年的俄語政治喜劇《人民公僕》裡扮演的「總統」形象深入人心。在劇中，男主角是一位高中歷史教師，而後又擔任總統大位，並且自詡爲一個深知國家發展問題的大眾，同時又深知歷史典故。劇中的男主角具有滿腔的愛國情懷與急迫想改革政府的熱忱。《人民公僕》政治喜劇的內容涉入了烏國的國家發展困境，更緊跟著當前時事。觀眾在大笑之餘，會對劇中總統宣揚的改革宣示、愛

臺灣大學社會科學院

格局：東部選民支持親俄的候選人；西部選民支持親歐的候選人，地區的差異性對選舉結果的影響力逐漸下降。

澤倫斯基在施政方面繼承了前任總統波羅申科的政治主張，即追求加入「歐盟」（EU）與「北大西洋公約組織」（North Atlantic Treaty Organization, NATO）。在外交方面，澤倫斯基支持烏克蘭加入北約和歐盟，但表示這需要全民公投授權。在對俄羅斯方面，主張和俄羅斯加強對話，用協商的方式解決問題，並期望與俄羅斯總統普京談判協商領土、地位等問題，盡早結束烏克蘭東部的戰爭。由於烏克蘭舊國會仍由前總統波羅申科的人馬把持，4 月期間試圖組建一個議會團體失敗後，2019 年 5 月澤倫斯基宣示就職後便宣布解散國會，提前舉行國會大選。烏克蘭國會有 450 名成員，有 225 名議員透過單一選區選舉產生，另外 225 名議員則是以比例代表制選出，但由於俄羅斯吞併克里米亞，再加上烏克蘭東部兩州（頓涅茨克州和盧甘斯克州）仍然處於紛爭狀態，在 225 個單一選區中，只有 199 個選區能夠舉行選舉，因此 450 席中只能改選 423 席。他領導的「人民公僕」（Слуга народу）政黨在 2019 年 7 月國會大選，席捲過半數的席次，寫下烏克蘭 1991 年獨立以來總統所屬的政黨在國會能單獨過半（參見表 3）。

表 3　2019 年 7 月烏克蘭國會選舉主要政黨席次、得票數和得票率

政黨名稱	政黨得票數	政黨得票率	單一選區席次	比例代表席次	總席次
Слуга народу（人民公僕）	6,307,097	43.16%	130	124	254
Опозиційна платформа—За життя（反對平台—為了生活）	1,908,087	13.05%	6	37	43
Всеукраїнське об'єднання «Батьківщина»（全烏克蘭聯盟 «祖國»）	1,196,256	8.18%	2	24	26
Європейська Солідарність（歐洲團結）	1,184,515	8.10%	2	23	25
Голос（聲音）	851,699	5.82%	3	17	20

資料來源：Центральна виборча комісія України (ЦВК) 烏克蘭中央選舉委員會（2019）。

國情懷以及其主張的烏克蘭國家主義路線，產生深刻印象。許多選舉研究分析都發現到支持澤倫斯基的選民，將作爲觀眾時的情感，複製到現實政治環境中而轉化爲選票。

臺灣人文社會期刊資料庫

澤倫斯基帶領的「人民公僕」政黨囊括 254 席，這是烏克蘭獨立後首次有政黨在國會取得絕對多數。取得組閣主導權後，澤倫斯基則鎖定與烏克蘭搖滾巨星「瓦卡洽克」（Святослав Вакарчук）的「聲音」（Голос）政黨尋求合作，共組執政多數聯盟。這次烏克蘭新國會得票最高的前五大政黨，除了「反對平台－爲了生活」爲親俄派政黨，其他四個政黨都是屬於親歐派政黨。

「人民公僕」政黨的成員大多是「政治素人」，包括行動主義者、企業家、律師，以及知名度很低的個人。其中有數位是與烏克蘭具爭議性的寡頭走得很近，像是「科洛莫伊斯基」（Ігор Коломойський），[13] 令外界感到憂心。波羅申科前總統在 2014 年至 2019 年執政期間，始終未能帶領烏克蘭走出流血革命的陰霾，亦因爲受制於俄羅斯，同時國內經濟遲遲未有好轉，民主革命的核心訴求—加入歐盟，亦沒見重大進展，再加上國內經濟停滯，造成烏克蘭人民極大的不滿。

二、對外經貿發展

烏克蘭危機爆發之前，烏國長期以來一直在歐盟與俄羅斯兩個巨人中間左右權衡，甚至於形成東部「親俄」與西部「親歐」的格局，因此在外交政策上無法形成統一的意見。獨立之初，烏克蘭執行的是一種親西方外交，對俄羅斯基本採取抵制的立場。1994 年 6 月烏克蘭與歐盟簽署「夥伴關係與合作協議」（PCAs），[14] 成爲第一個簽署此協議的後蘇聯國家。1996 年歐盟部長會議公布了對烏克蘭的行動計劃，表示要迅速發展並加強與歐盟的政治經濟關係。1999 年 12 月歐洲聯盟高峰會通過了「歐盟對烏克蘭

---

13 烏克蘭億萬富翁、商業寡頭，曾擔任地方州長。自 2006 年起，財富位列烏克蘭第二或第三位，世界排名第三百多位。他還擁有 1+1 媒體集團 70% 左右的股份，該集團的電視頻道放映了喜劇《人民公僕》，該劇男主角澤倫斯基之後當選烏克蘭總統。

14 〈夥伴關係與合作協議〉作爲一種非優惠貿易安排，在合作夥伴之間給予「最惠國待遇」（most favored nation, MFN）。但是歐盟與第三方簽訂的貿易或合作協定並非是單純的經濟協議，而是一種政治條件性的工具，透過貿易促進尊重人權和法治，實現民主發展的有利條件。歐洲聯盟一方面可以向第三方提供經濟好處，作爲對其尊重人權與民主法治的回報；另一方面，當三方違反民主法治和人權的原則時，歐盟可以廢除、中止或減少優惠地位與援助。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論文

共同戰略」（The EU common strategy on Ukraine）文件，詳細規劃了歐盟對烏克蘭戰略目標與實施方式。庫奇馬總統執政期間（1994～2005 年），烏國採取避險策略，在不得罪俄羅斯的情況下，持續與歐盟發展雙邊關係。

2005 年 2 月親歐派的尤申科總統上台，對外政策導向西方，並於 2005 年底宣佈成立了「古烏姆民主與經濟發展組織」（Организация за демократию и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е развитие－ГУАМ），[15] 古烏姆民主與經濟發展組織的主要任務之一是建立起成員國之間的自由貿易區，推進成員國家貿易自由化。除此之外，對於莫斯科採取抵制的立場，並在「獨立國協」內組織建立具有離心傾向的國際組織，主要是寄望於西方國家能保障其情勢穩定，協助四個原蘇聯地區國家（喬治亞、烏克蘭、亞塞拜然、摩爾多瓦）儘速融入歐洲社會。對俄外交的重點是穩定能源供應，改善與俄羅斯的關係；對歐外交是採取措施簽署「自由貿易協定」（FTA），讓烏克蘭的生活標準提升到歐洲水準。當時俄羅斯官方就已經提出警告，不要啓動烏克蘭和歐盟自由貿易區。2005 年 2 月烏克蘭與歐盟簽署「歐盟與烏克蘭的行動計劃」（EU-Ukraine Action Plan）。[16] 此一計畫爲期 3 年，主要包括：儘快重新審議烏克蘭與歐洲聯盟建立「自由貿易區」的可行性；歐盟將在能源、簡化雙方往來人員簽證程序等展開高層的對話，同時歐盟承諾向提出烏克蘭貸款方案，在經濟上援助烏國。親歐派尤申科總統執政期間，積極推動烏克蘭與歐盟成爲聯繫國，烏歐互動關係發展迅速。

蘇聯解體獨立之後的烏克蘭，大多數的時間選擇傾向於歐洲，這是俄

---

15 「古烏姆民主與經濟發展組織」的前身是「古烏姆集團」。爲了抵制俄羅斯對於獨立國協的主導與反制「俄白聯盟」，喬治亞、烏克蘭、亞塞拜然與摩爾多瓦四國總統於 1997 年 10 月舉行會晤並且簽署公報，決定成立區域性聯盟。1999 年 4 月 24 日，烏茲別克總統在赴華盛頓參加「北約」（NATO）50 周年慶典期間宣布加入其中。同日，五國總統提出了第一份聯合文件—《華盛頓宣言》。該區域組織的名稱以各個國家的第一個俄文字母組成，爲 ГУУАМ。在前成員烏茲別克於 2005 年 4 月正式退出之後改爲 ГУАМ。「古烏姆集團」成立之後，曾經與北約和歐盟進行了多項合作，同時歐美國家也給予很大的支持。最初目標是推動成員國的民主化進程，實現與歐洲的整合，並且融入西方世界（Cameron & Orenstein, 2012: 3-4）。

16 「歐盟與烏克蘭的行動計劃」乃是歐盟要求烏克蘭執行一系列措施的集合文件，但該文件並無承諾烏克蘭加入歐盟的明確前景，這也使得烏克蘭政府的領導人執行此文件時，缺乏執行的動力。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羅斯所無法容忍的。2010 年上台的親俄派總統亞努科維奇，雖然上台初期仍不放棄與歐盟簽署聯繫國協議，但面對俄羅斯的壓力，在 2013 年 11 月 21 日政策轉彎，宣佈暫停與歐盟簽署「聯繫國協定」，這個決定造成許多烏克蘭人的不滿，紛紛走上街頭抗議。抗議者聚集在基輔的獨立廣場，衝擊總統府、政府大樓及國會大廈，造成親俄政府被趕下台，親歐派政治政黨再次透過選舉重新上台執政。過去，對外政策究竟要選擇親俄還是親歐，烏克蘭時常爲此問題陷入政局動盪，處在大國博弈的漩渦當中，只能在有限的空間中走出自己的道路，但在 2013～2014 年親歐盟示威運動後，烏克蘭已選擇親歐路線，逐步邁向政治與經濟上的歐洲國家。

2017 年 7 月歐盟 28 個成員與烏克蘭共同簽署「聯繫國協定」（AA），同年 9 月正式生效（參見表 4），雙方透過十多年的談判，烏克蘭才得以跟歐盟簽署該協議。歐盟面對俄烏爭執的回應就是加快延宕已久的聯繫國協定簽署，但不急於強化歐烏間的關係。聯繫國協定是在歐盟和非歐盟國家之間建立一個框架，承諾雙方整合的政策，包括在法律和法規間廣泛的合作，同時烏克蘭承諾採取改革措施以符合歐盟的標準。該協定旨在確立歐盟與烏克蘭密切與持續發展之關係，但並未給予烏克蘭歐盟候選國的資格，此外在安全合作方面，協定不承諾歐盟向烏國提供集體安全保障或其他軍事援助。從協定的內容來看，歐盟不急於強化與烏克蘭的關係是有其顧慮因素所致，主要是因爲俄羅斯每年對歐盟有著大量的石油與天然氣供給（Симония & Торкунов, 2014: 13-14），從供應量和價格上，歐盟無法找到替代俄羅斯的第三國，與俄保持能源合作穩定最符合其經濟效益。歐盟不希望因烏克蘭的問題，進而與俄羅斯對抗，破壞了整個歐洲的經濟穩定，而且一旦讓烏克蘭入歐後，烏國的廉價勞工將流入西歐，造成就業市場衝擊，因此歐盟不急於強化與烏克蘭的關係。

2018 年 4 月時任總統波羅申科正式宣布，烏克蘭退出「獨立國協」（СНГ），並將關閉其駐獨立國協總部各相應機構的代表處。退出獨立國協組織的烏克蘭，其商品將面臨進出口關稅的增加，同時成爲美國與「北大西洋公約組織」（NATO）對抗俄羅斯的最前線國家。[17] 烏克蘭決定退出

[17] 「北大西洋公約組織」（NATO）是歐洲及北美洲國家爲實現防衛合作而建立的國際組

臺灣人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表 4　烏克蘭與歐盟及獨立國協／歐亞正式關係發展的里程碑

歐　盟（EU）	日　期	獨立國協（CIS）／歐亞體制
	1991.12	獨立國協（CIS）創始會員國
	1994.04	獨立國協自由貿易區協議簽署
夥伴關係與合作協議（PCA）簽署	1994.06	
夥伴關係與合作協議（PCA）生效	1998.03	
	1999.04	CIS 自由貿易區協議定書簽署＊
歐盟對烏克蘭的共同戰略（Common Strategy）	1999.12	
	2003.09	共同經濟空間（CES）協議簽署
歐盟睦鄰政策（ENP）框架下簽署歐盟與烏克蘭的行動計劃	2005.02	
協商開放新的強化協議	2007.03	
簽署歐盟東部夥伴關係計畫（EaP）	2009.05	
	2011.10	CIS 自由貿易區協議（FTA）簽署
歐盟聯繫國協議（AA）談判完成	2011.12	
草簽歐盟聯繫國協議（AA）	2012.03	
	2013.05	與歐亞經濟委員會簽署深化關係備忘錄（Memorandum）
宣告不簽署聯繫國協議（AA）	2013.11	
簽署聯繫國協議（AA）政治部分	2014.03	
簽署歐盟與烏克蘭深化與廣泛自由貿易協定（DCFTA）經濟部分	2014.06	
歐洲議會批准烏克蘭聯繫國協議	2014.09	
烏克蘭成為歐盟（EU）的聯繫國	2015.03	
	2016.01	終止與烏克蘭的自貿協定（FTA）
聯繫國協議（AA）正式生效	2017.09	
	2018.04	烏克蘭退出獨立國協（CIS）

＊ 1999 年獨立國協 FTA 議定書是 1994 年獨立國協 FTA 的修正和補充文件。1999 年的議定書促使雙邊協定成為獨立國協國家貿易體制結構的重要組成部分，同時將自由貿易列入經濟合作的議程當中，這反映了當時獨立國協國家之間的經貿關係變化。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自 Dragneva & Wolczuk (2014: 244)

織。1949 年 3 月 18 日，美國、英國及法國公開建立北大西洋公約組織，1949 年 4 月 4 日在美國華盛頓簽署〈北大西洋公約〉後正式成立。爲與以前蘇聯爲首的東歐集團國成員相抗衡。公約第 5 條規定成員國受到的攻擊一旦被確認，其他成員國將作出即時反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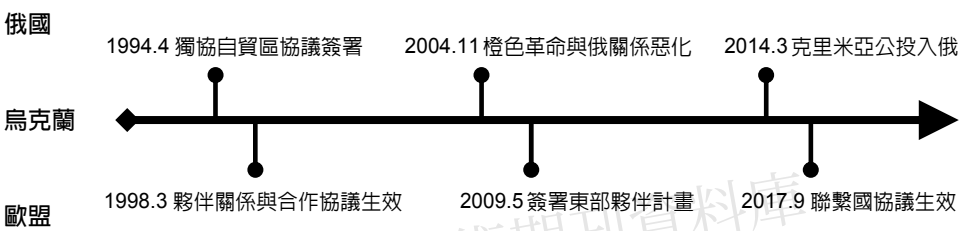
臺灣大學期刊資料庫

獨立國協在外交上是一個明確重要的表態，這表明了與歐盟整合的決心。對於俄國而言，沒有烏國的歐亞聯盟無疑缺少了歐洲元素，這使得歐亞聯盟戰略在地緣政治上，遭遇到重大的打擊。

肆、烏克蘭個案與後蘇聯國家對外經貿關係選擇的對比分析

由於烏克蘭國內意見的分歧，同時東西毗鄰歐盟和俄羅斯這兩大政經力量，過去烏克蘭的政治和經濟發展遭遇如此之多的波折，主因是地理上處於兩大強權之間的小國，而且外部強權之間的關係是常處於競爭的狀態，造成大國地緣政治的因素影響到小國國內的政經穩定。2013 年底烏國受到來自俄羅斯方面的壓力，宣佈暫停與歐盟簽署協定，進而引發了烏克蘭國內各種矛盾和大規模的抗議，便可得到充分印證。俄羅斯爲何不能忍受烏克蘭入盟，而且如此急切維繫舊有的影響力，美國前國家安全顧問「布里辛斯基」（Zbigniew Brzezinski）曾說：「沒有烏克蘭，俄羅斯就不再是一個歐亞帝國」。烏克蘭坐擁遼闊領土，爲西歐和俄國的戰略緩衝區，欠缺烏克蘭的參與，俄羅斯推動的「歐亞聯盟」之地緣政治價值將大打折扣，這就是爲何俄國急切維繫舊有的影響力，並說服烏克蘭前總統亞努科維奇拒簽「聯繫國協議」，改爲加入歐亞聯盟。但也因爲烏克蘭危機的爆發，使得烏國不再夾在歐盟與俄羅斯之間，左右權衡，而是不斷推進加入歐盟的進程，逐步切割與俄羅斯的聯繫，更加堅定選擇走向融入歐洲的道路。圖 1 是作者整理烏克蘭與歐盟暨俄羅斯互動發展過程重大事件的時間轉折點。

圖 1　烏克蘭與歐盟暨俄羅斯互動的大事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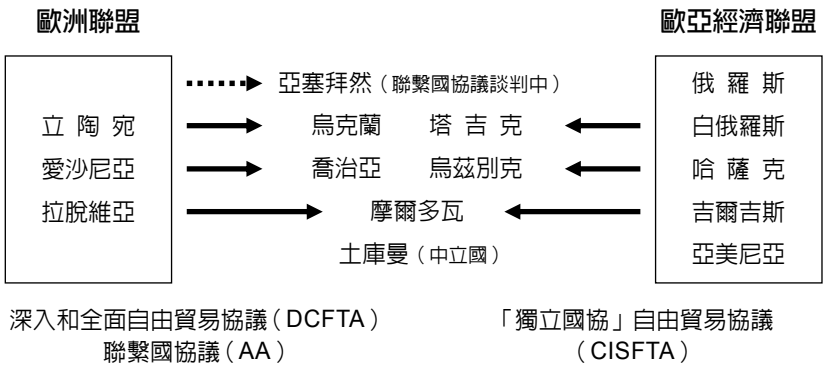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觀察其它後蘇聯國家，除了已經加入歐盟的拉脫維亞、愛沙尼亞與立陶宛三國，以及土庫曼（中立國）不參與區域經濟整合之外，剩餘的國家在原蘇聯地區皆受到俄羅斯和歐盟兩方的影響。烏克蘭、喬治亞與摩爾多瓦三國已經與歐盟簽署「聯繫國協定」及「深化和全面的自由貿易協定」，其餘的歐盟東部夥伴，像是亞塞拜然與歐盟的「聯繫國協定」，仍在談判進行中；另一方面，俄羅斯、哈薩克和白俄羅斯已經是「歐亞經濟聯盟」的成員，經濟聯盟已經爲這三個國家帶來局部的經濟整合，而亞美尼亞與吉爾吉斯也是成員國之一（Иноземцев, 2014: 71-82）（參見圖 2）。

圖 2　歐盟與歐亞經濟聯盟在後蘇聯國家的聯繫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後蘇聯國家面臨歐盟與俄羅斯的雙重影響，當前只有摩爾多瓦與歐盟簽署「聯繫國協定」及「深化和全面的自由貿易協定」，同時又與獨立國協簽署「獨立國協自由貿易協定」。過去爲執行中亞戰略的實施，歐盟執委會在《2007-2013 年歐盟援助中亞地區戰略》中使用「發展合作工具」（Development Cooperation Instrument, DCI）援助 7.5 億歐元，[18] 2014 至

[18] 該計畫的援助目標是促進中亞國家的穩定與安全，幫助追求可持續的經濟發展與減少貧困。爲此，歐盟確立了三大優先領域：一、推動中亞地區的合作並促進良好的周邊關係，所用資金佔總預算的 30%～35%；二、減少貧困和提高人民生活水準，佔預算的 40%～45%；三、推動治理和經濟改革，佔預算的 20%～25%（European Commission, 2006: 3-32）。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2020 年繼續向中亞提供 10 億歐元的援助，幫助中亞國家經濟發展，推動與歐盟更緊密的區域合作，但成效並不顯著。俄羅斯方面則是提出關稅同盟，建立歐亞經濟聯盟，更加稀釋了歐盟對於中亞國家的經濟吸引力。

根據俄羅斯政府在 2019 年的統計資料顯示，眾多的外勞是來自中亞五國，其中以烏茲別克、塔吉克與吉爾吉斯的外勞人數最多。以塔吉克爲例，在俄國的龐大外勞人口，自然擁有相當的外匯收入，而過分依賴來自俄國外匯收入的經濟結構，使得塔吉克在談判桌上面對俄羅斯的外交壓力難以抗拒（Федеральная служба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й статистики, 2019）。有了這一層的經濟依賴，足以給俄羅斯有機會在政治或經濟上對中亞國家發揮影響力。另外，中亞五國當中比較特殊的個案是土庫曼，土國因過去長期依賴蘇聯之政經援助，造成獨立後對俄羅斯之政經依賴仍舊很深，難以擺脫俄國之操控。2005 年 8 月土庫曼宣佈退出獨立國協，奉行永久中立國的基本國策，在外交政策上以追求永久中立及保持等距外交爲最高指導原則，期望能擺脫俄羅斯的控制。

位於外高加索地區的後蘇國家中，喬治亞是反俄的典型代表，主要是因爲 2008 年的領土爭議，在喬治亞境內的「南奧塞提亞」（Южная Осетия）爆發激戰，[19] 俄國戰勝之後，未將軍隊撤出喬治亞境內的南奧塞提亞，而且承認南奧塞提亞獨立並建交，留下爭議的占領國土問題。因此，喬治亞在政治上傾向歐盟和西方，最終目標是加入歐盟。另一個外高加索國家是亞美尼亞，該國是外高加索國家中與俄羅斯經貿交流最密切的國家，2015 年加入「歐亞經濟聯盟」（EEU）。過去，亞美尼亞曾經支持亞塞拜然的自治區 —「納戈爾諾－卡拉巴赫」（Nagorno-Karabakh）對抗亞塞拜然，[20] 進

---

19 喬治亞於 2008 年 8 月 7 日出兵突襲早已在 1990 年 9 月單方面宣布脫離喬治亞獨立的「南奧塞提亞」，喬治亞的軍隊包圍並砲擊南奧塞提亞的首府與俄羅斯維和部隊營區，俄羅斯立即派兵援助「南奧塞提亞共和國」。在俄羅斯猛烈的轟炸之下，喬治亞軍隊開始撤離南奧塞提亞的首府，之後俄羅斯和喬治亞雙方同意停火，簽訂協議撤軍。此事件之後，喬治亞與俄羅斯關係加速惡化，喬治亞在對外關係上一面倒向西方和歐盟，與俄羅斯處於對立狀態。

20 「納戈爾諾－卡拉巴赫」是亞塞拜然的一個自治區，該區域被亞塞拜然的國土包圍著。在蘇聯時期，政府決策當局將納卡被劃歸爲亞塞拜然的領土，但是由於它的人口多是由亞美尼亞人所組成，亞美尼亞對此安排感到相當不滿。在歷史上亞美尼亞與亞塞拜然就

臺灣大學社會科學圖書館

而演變成亞美尼亞和亞塞拜然之間的戰爭（Coyle, 2018: 219-224）。1994 年 5 月，兩國簽訂停火協議，戰爭才宣告結束，2016 年 4 月兩國在「納戈爾諾－卡拉巴赫」地區的爭議又爆發衝突，數日後雙方再次達成停火協議。過去這段期間，亞美尼亞與亞塞拜然大小衝突一直未曾間斷，由於擁有石油與天然氣資源，俄國與西方國家積極介入亞塞拜然事務，基於自身利益考量，亞塞拜然減少輸出低價油氣給俄國，轉而以較高的價格輸送給歐美，此外在納ー卡問題上俄羅斯支持自己的對手亞美尼亞，使得亞塞拜然對外政策選擇親歐美，目前與歐盟的聯繫國協定正在談判進行中。

另一方面，位於歐陸地區的摩爾多瓦在經濟上對俄國依賴很深，而 2014 年 6 月歐盟與摩國簽署夥伴協議，此舉引起俄羅斯的反彈。摩爾多瓦公民可以免簽證前往歐盟，並加入自由貿易區，同時獲得歐盟的資金挹注，俄羅斯對此立即採取報復措施，禁止摩爾多瓦的肉類和蔬菜等多項食品進口，對仰賴農產品出口的摩爾多瓦構成巨大壓力。摩爾多瓦至今仍徘徊在歐盟與俄國之間，國內政治依舊陷入親俄羅斯與希望加入歐盟等兩大勢力分裂的局面，一部分的民眾想要與俄國保持密切關係，另一部分的民眾則尋求追隨羅馬尼亞模式，想與歐洲拉近距離。由於摩爾多瓦和羅馬尼亞的民族、文化及歷史相關連結很深，同時境內有不少民眾支持與羅馬尼亞統一。儘管如此，親俄國的民意仍不容小覷，目前國會第一大黨爲親俄派政黨，[21] 因此在處理與歐盟和俄羅斯的對外事務上，摩爾多瓦應當格外謹慎，避免步上烏克蘭的後塵。最後，歐陸的另一個國家—白俄羅斯與俄羅斯政經關係密不可分，目前白俄羅斯是獨立國協、歐亞經濟聯盟與俄白聯盟的成員國，正全面參與俄羅斯推動的區域統合。綜合上述分析，面對歐盟與俄羅斯的爭取，原蘇聯地區少部分國家是擺盪在兩者之間（摩爾多瓦），多數國家會在親歐盟與親俄國間選擇其一（參見表 5）。

一直對納卡的歸屬問題有所爭議，雙方都認爲納戈爾諾－卡拉巴赫是屬於自己的領土。

[21] 2019 年 2 月摩爾多瓦經過國會選舉之後，親俄派政黨「摩爾多瓦社會主義黨」（Party of Socialists of the Republic of Moldova）成爲國會第一大黨，該政黨反北約以及反歐盟，對外政策採取親俄羅斯的立場。國會第二大黨則是「摩爾多瓦民主黨」（Democratic Party of Moldova），屬於親歐派政黨，主張融入歐盟，同時也與獨立國協國家進行合作，推動平衡的外交政策。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表 5 烏克蘭與後蘇聯國家對外經貿關係的選擇

區域	國家	對外關係選擇
歐陸地區	烏克蘭	親歐盟
	白俄羅斯	親俄國
	摩爾多瓦	親歐親俄間擺盪（避險）
外高加索地區	亞塞拜然	親歐盟
	喬治亞	親歐盟
	亞美尼亞	親俄國
波羅的海地區	立陶宛	親歐盟
	愛沙尼亞	親歐盟
	拉脫維亞	親歐盟
中亞地區	哈薩克	親俄國
	烏茲別克	親俄國
	塔吉克	親俄國
	吉爾吉斯	親俄國
	土庫曼	中立國家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烏克蘭西夾在歐盟和俄羅斯這兩大政經力量中心，戰略地位重要，對於其它後蘇聯國家而言，像是中亞五國，它們的戰略地位價值以及歐盟的經濟影響力，與烏克蘭比較起來則是相對地低。相較之下，中亞地區的哈薩克、塔吉克與烏茲別克等國，對於俄國的經濟依賴較深，會比較積極參與俄羅斯推動經濟統合，以及加入歐亞經濟聯盟。而原蘇聯地區的歐陸和外高加索國家，除了白俄羅斯親俄之外，烏克蘭和喬治亞兩國與俄羅斯有著領土的爭議，因此烏喬兩國積極參與歐盟的整合。至於波羅的海三小國（愛沙尼亞、拉脫維亞與立陶宛），最早自蘇聯獨立出來，因長期受到俄羅斯的欺壓，始終拒絕加入獨立國協以及俄羅斯推動的歐亞聯盟。[22] 烏克蘭

[22] 波羅的海三國（愛沙尼亞、拉脫維亞與立陶宛），是最早加入歐洲聯盟的後蘇聯國家，三國均加入申根公約與歐元區。波羅的海三國從蘇聯獨立之後，奉行親西方的對外政策，疏遠與俄羅斯的關係。過去波羅的海三國被併入蘇聯的時期，留給他們的是沉痛的記憶，蘇聯解體獨立之後，愛沙尼亞、拉脫維亞和立陶宛紛紛加入「北大西洋公約組織」，希望在軍事上依靠西方集體防衛確保其安全。

臺灣大學期刊資料庫

危機爆發後，使得部分擺盪在歐盟與俄羅斯雙方拉攏的後蘇聯國家有所警惕，像是歐陸的摩爾多瓦。採取避險策略的後蘇聯國家，通常是在兩大強權能容忍的情況下所進行的，若是俄國要求選邊站，後蘇聯國家即刻失去兩邊都討好的能力，只能在抗衡和扈從兩種策略當中擇一，從烏克蘭的個案便可獲得證實。目前實行避險策略的摩爾多瓦，如果加速與歐盟的整合，將引起俄國的反制，爲了避免走上烏克蘭的後塵，摩爾多瓦將會減緩與歐盟的整合速度。

伍、結論

從烏克蘭的案例研究結果得知，採取避險戰略的小國（烏克蘭），必須有個先決條件，就是在大國（俄羅斯）能接受的情況下所進行，若是大國無法接受並要求小國選邊站時，在「兩強之間難爲小」的困境下，烏克蘭便失去兩邊都討好的能力，避險的對外政策很難再持續下去。當歐盟與俄羅斯權力競合還未明朗化之前，應該避免做出明確的聯盟需求，後蘇聯國家比較正確的做法就是在兩強間保持等距。烏克蘭的個案發展結果即是從過去採行避險戰略轉變到選擇單邊（親歐盟）的對外政策，這對於後蘇聯國家而言，代表採取避險策略的空間越來越小，同時實行避險的國家數量正逐漸減少，目前原蘇聯地區國家只剩下摩爾多瓦仍在實施。仔細探究其原因，主要是因爲俄羅斯喪失了在原蘇聯地區的主導性地位，造成地緣戰略空間被擠壓，因此擔憂更加強烈，迫使採取更強硬的政策來應對歐盟的向東擴張，從而增強後蘇聯國家選邊站的壓力。

後蘇聯國家之中的喬治亞選擇了歐盟這一方，因喬治亞和俄羅斯曾經爆發過軍事衝突，反俄情緒高漲，目前正積極參與歐盟的整合，企圖擺脫俄國的控制；相反地，歐陸的白俄羅斯是後蘇聯國家中與俄羅斯互動最密切，經濟依賴俄國，選擇俄羅斯的這一方。在政治與軍事上，與俄羅斯有衝突的後蘇聯國家，會選擇與歐盟整合，以牽制俄羅斯的威脅，像是烏克蘭和喬治亞；在經濟上，愈依賴俄羅斯的後蘇聯國家，愈會選擇與俄羅斯整合，且更容易受到俄羅斯對外政策的影響。我們從中亞國家比較積極參與俄羅斯推動的歐亞經濟聯盟便可得到印證，但土庫曼永久中立國的案

臺灣人博碩士論文知識加值系統

例，則是特殊的例外。經過了烏克蘭危機事件之後，擺盪在歐盟與俄羅斯爭取中的後蘇聯國家，像是摩爾多瓦，在採取避險的對外政策上，應更加審愼處理與歐盟及俄羅斯的互動關係，以避免衝突的爆發。

現今，國際關係學界對於避險的討論仍在持續進行，國內外相關的研究文獻多數是在探討東亞地區的國家，面對中國崛起所帶來的不確定性，許多國家在中美之間進行避險策略。針對原蘇聯地區與中東歐國家的避險研究，則是相對較少，本研究透過烏克蘭的個案分析，正可填補歐亞地區案例研究的缺乏，累積更多不同區域國家的個案，提供不同的觀點和補充，以增強朝向理論發展的可驗證性。

過去烏克蘭每遇到重大抉擇的時刻就會出現街頭政治運動，除了西方的干預，俄羅斯與歐盟對它的拉攏等原因外，最重要的原因在於烏克蘭的內部，國內本身就處於一種分裂的情況，這對烏克蘭來說，是一個難題。領導人雖有時親歐，有時親俄，但仍然無法解決國內的分裂狀態，東部民眾不願脫離俄羅斯，西部居民期盼能加入歐盟，烏國常陷入兩難的困境。在對外政策的表現上，面對國際間利害交錯不定的情勢下，烏克蘭採取避險策略，一方面與潛在威脅國俄羅斯持續交往，另一方面持續加強與歐盟等國際組織的關係，以牽制俄國。此外，更可以同時滿足國內東部民眾主張與俄羅斯維持緊密關係，以及西部居民希望加入歐盟的訴求。但由於與歐盟簽署聯繫國協議觸碰到大國的紅線，俄羅斯無法忍受失去烏克蘭的歐亞聯盟，進而施壓親俄政府迫使政策轉彎，造成西部民眾走上街頭抗爭，推翻親俄政府。

另外，克里米亞半島西南方的「塞凡堡」是俄國黑海艦隊的駐紮基地，之前雙方達成共識簽署協議，烏克蘭同意俄羅斯海軍基地期限延長到 2042 年，但亞努科維奇親俄政府遭推翻，協議恐將遭到終止。俄方擔心失去海軍戰略要地塞凡堡，因爲沒有塞凡堡海軍基地等於放棄了黑海的控制權，同時也喪失通往大西洋的航道，嚴重侵害到俄羅斯的國家利益。因此，基於軍事戰略和地緣政治的考量，俄國立即改變過去經濟合作的對外策略，採行對外武力兼併的措施，以武裝軍事力量接管克里米亞半島，並透過公民投票，讓克里米亞脫離烏克蘭加入俄羅斯。

2013～2014 年烏克蘭危機爆發後，國內親歐盟與親俄國的兩難困境出

臺灣人文與藝術期刊資料庫

現了轉變，烏克蘭改變了過去的「避險」策略，選擇與歐盟之間成爲「夥伴」關係，加入歐洲聯盟甚至加入北大西洋公約組織，堅定推行「脫俄入歐」的基本國策，逐步切割與俄羅斯的聯繫，俄烏兩國同時也啓動了相互制裁的措施。2019 年的總統與國會選舉結果顯示，親歐派與親俄派兩大陣營勢均力敵的情況已不存在，親西方的政治勢力處於優勢地位。[23] 自從 2014 年克里米亞事件與烏克蘭東部地區的軍事衝突發生後，烏國決心推進加入歐盟的進程，切割與俄羅斯的聯繫，像是 2016 年與歐盟簽署「自由貿易區協定」、2018 年退出「獨立國協」國際組織。2019 年的國會選舉，新總統澤倫斯基的「人民公僕」政黨，拿下國會過半數的席次，這是烏克蘭憲政發展史中首次出現，這將有利於新總統改革政策的推行。此外，經過了 2014 年與 2019 年兩次的總統和國會選舉，親歐政黨在行政與立法部門掌握了控制權，未來在「半總統制」運作之下的烏克蘭，總統與國會多數黨派皆屬親歐派同一陣營的情況，很可能將成爲常態。

參考書目

一、中文部分

吳玉山，1997a，〈抗衡與扈從：面對強鄰時的策略選擇（上）〉，《問題與研究》，36(2): 1-32。Wu, Yu-shan. 1997. “Kangheng huo huzong: miandui qianglin shi de celue xuanzeshang” [The Choice of Strategy toward One’s Strong Neighbor: Balancing or Bandwagoning, part I]. *Issues and Studies* 36(2): 1-32.

吳玉山，1997b，〈抗衡與扈從：面對強鄰時的策略選擇（下）〉，《問題與研究》，36(3): 61-80。Wu, Yu-shan. 1997. “Kangheng huo huzong: miandui qianglin shi de celue xuanzexia” [The Choice of Strategy toward One’s Strong Neighbor: Balancing or Bandwagoning, part II]. *Issues and Studies* 36(3): 61-80.

洪美蘭，2008，〈從轉型政策效應論獨協國家之顏色革命〉，《東吳政治學報》，

[23] 2019 年烏克蘭的總統與議會選舉，東部分離主義勢力所占據的「頓涅茨克州」（Донецька область）和「盧甘斯克州」（Луганська область）部分地區，一些合格的選民無法參加投票，再加上「克里米亞」獨立公投之後併入俄羅斯聯邦，沒有參與 2019 年的選舉，造成親俄的票源縮減。根據歷屆烏國總統和國會選舉的投票結果顯示，克里米亞半島與烏東地區的選民大多數是支持親俄派的候選人和政黨。

臺灣人文社會期刊資料庫

26(3): 149-196。Hung, Mei-lan. 2008. “Cong zhuanxing zhengce xiaoying lun duxie guojia zhi yanse geming” [A Study on the Color Revolution in the CIS from the Effects of Transition Policies]. *Soochow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26(3): 149-196.

楊三億，2018，〈烏克蘭安全策略選擇：內部因素分析〉，《問題與研究》，57(1): 1-28。Yang, San-yi. 2018. “Wukelan ancyuan syuan: celue xuanze neibu yinsu fenxi” [Ukraine’s Security Strategic Choices: A Domestic Perspective]. *Issues & Studies* 57(1): 1-28.

二、西文部分

Cameron, D. R. & M. A. Orenstein. 2012. “Post-Soviet Authoritarianism: The Influence of Russia in Its Near Abroad.” *Post-Soviet Affairs* 28(1): 1-44.

Coyle, J. J. 2018. *Russia’s Border Wars and Frozen Conflicts*.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D’Anieri, P. 2019. “Gerrymandering Ukraine? Electoral Consequence of Occupation.” *East European Politics and Societies and Cultures* 33(1): 89-108.

Dragneva, R. & W. Kataryna. 2014. “The EU-Ukraine Association Agreement and the Challenges of Inter- Regionalism.” *Review of Central and East European Law* 39(3-4): 233-252.

Duverger, M. 1980. “A New Political System Model: Semi-Presidential Government.” *European Journal of Political Research* 8(2): 165-187.

European Commission. 2006. “European Community Regional Strategy Paper for Assistance to Central Asia for the period 2007-2013.” in http://www.eeas.europa.eu/archives/docs/central_asia/rsp/07_13_en.pdf. Latest update 19 June 2020.

Fiori, A. & P. Andrea. 2015. “Hedging in Search of a New Age of Nonalignment Myanmar Between China and the USA.” *The Pacific Review* 28(5): 679-702.

Goh, E. 2005. *Meeting the China Challenge: The U. S. in Southeast Asian Regional Security Strategies (Policy Studies 16)*. Washington, D. C.: East-West Center.

Herron, E. S., B. Fitzpatrick, & M. Palamarenko. 2019. “The Practice Implications of Legislative Proxy Voting in Ukraine.” *Post-Soviet Affairs* 35(1): 41-62.

Kozachenko, I. 2019. “Fighting for the Soviet Union 2.0: Digital Nostalgia and National Belonging in the Context of the Ukrainian Crisis.” *Communist and Post-Communist Studeis* 52(1): 1-10.

Kudelia, S. 2014. “The House That Yanukovych Built.” *Journal of Democracy* 25(3): 19-34.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Kuik, C. C. 2008. “The Essence of Hedging: Malaysisi and Singapore’s Response to a Rising China.” *Contemporary Southeast Asia* 30(2): 159-185.

Kuik, C. C. 2016. “How do Weaker States Hedge? Unpacking ASEAN States’ Alignments Behavior toward China.”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25(100): 500-514.

Kuzio, T. 2013. “Yushchenko versus Tymoshenko: Why Ukraine’s National Democracy Are Divided.” *The Journal of Post-Soviet Democratization* 21(2): 215-240.

Kuzio, T. 2018. “Russian and Ukrainian Elites: A Comparative Study of Different Identities and Alternative.” *Communist and Post-Communist Studeis* 51(4): 337-347.

Matsiyevsky, Y. 2018. “Revolution without Regime Change: The Evidence from the Post-Euromaidan Ukraine.” *Communist and Post-Communist Studeis* 51(4): 349-359.

Matveeva, A. 2018. “Russia’s Power Projection after the Ukraine Crisis.” *Europe-Asia Studies* 70(5): 711-737.

Mayhew, A. 1998. *Recreating Europe: The European Union’s Policy towards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Nielsen, K. L. & M. Vilson. 2014. “The Eastern Partnership: Soft Power Strategy or Policy Failure?” *European Foreign Affairs Review* 19(2): 243-262.

Nitoiu, C. 2018. “The Influence of External Actord on Foreign Policy in the Post-Soviet Space.” *Europe-Asia Studies* 70(5): 685-691.

Roberts, S. P. & A. Moshes. 2016. “The Eurasian Economic Union: A Case of Reproductive Integration?” *Europe-Soviet Affairs* 32(6): 542-565.

Ryabchuk, A. 2014. “Right Revolution? Hopes and Perils of the Euromaidan Protests in Ukraine.” *Debatte: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 22(1): 127-133.

Schenider, C. J. 2009. *Democratization: Conflict, Negotiation and European Union Enlargement*.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Shugart, M. S. & J. M. Carey.1992 *Presidents and Assemblies: Constitutional Design and Electoral Dynamic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Shulman, S. 2004. “The Contours of Civic and Ethnic National Identification in Ukraine.” *Europe-Asia Studies* 56(1): 35-56.

Stykow, P. 2019. “The Devil in the Details: Constitutional Regime Types in Post-Soviet Eurasia.” *Post-Soviet Affairs* 35(2): 122-139.

臺灣大學圖書館期刊資料庫

Vieira, A. V. G. 2016. “Eurasian Integration: Elite Perspectives Before and After the Ukraine Crisis.” *Europe-Soviet Affairs* 32(6): 566-580.

Weitsman, P. A. 2004. *Dangerous Alliances: Proponents of Peace, Weapons of War*.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Wilson, A. 2014. *Ukraine Crisis: What It Means for the West*. New Haven &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Yan, H. T. 2018. “Comparing Democratic Performance of Semi-Presidential Regimes in the Post-Communist Region: Omnipotent Presidents and Media Control.” *Communist and Post-Communist Studies* 50(4): 263-275.

Гаман-Голутвина, О. В., Е. Г. Пономарева, & Л. Н. Шишелина. 2014. “‘Восточное партнерство’: борьба сценариев развития.” *Полис* 5: 20-40.

Иноземцев, В. Л. 2014. “Евразийский экономический союз: потерянные в пространстве.” *Полис* 6: 71-82.

Мациевский, Ю. В. 2018. “Вловушке гибридности: политический режимв Украине после революции 2014 года.” *Полис* 1: 96-115.

Миронов, В. 2015. “Российская девальвация 2014-2015 гг.: падение в пропасть или окно возможностей?” *Вопросы экономики* 12: 5-31.

Симония, Н. А. & А. В.Торкунов. 2014. “Энергобезопасность ЕС и Россия.” *Полис* 5: 9-19.

Федеральная служба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й статистики. 2019. “Российский статистический ежегодник 2019.” in https://eng.gks.ru/Publications/document/74811. Latest update 19 June 2020.

Центральна виборча комісія України (ЦВК). 2019. “Вибори народних депутатів України.” in https://cvk.gov.ua/vibory_category/vibori-narodnih-deputativ-ukraini.html. Latest update 16 June 2020.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A Study on the Choices of Foreign Economic and Trade Relations in Post-Soviet Countries:
The Case of Ukraine*

*Cheng-chi Kuang***

Abstract

After the collapse of the Soviet Union, many integration organizations, such as the Commonwealth of Independence States (CIS), the Eurasian Economic Community, and the Eurasian Economic Union appeared in the former Soviet territory. However, because there are serious differences in the positions of member states, integration has been slow. CIS countries, which are within the traditional sphere of influence and serve as a natural buffer zone for Russia, are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Russian regional security, stability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On the other hand, as the EU expands eastward, the Eastern Partner Program was launched in an attempt to influence the countries of the former Soviet Union and squeeze into Russia's geostrategic space.

After the Ukrainian crisis, the political power of the pro-European faction was in an overwhelmingly superior position. Ukraine chose to side with the EU and confronted Russia. However, due to pressure from Russia, the domestic economy of Ukraine has not improved and there has been no significant progress in joining the EU. The rise of the new Ukrainian President Zelensky in 2019 represents the dissatisfaction of the Ukrainian people with traditional political figures. This paper finds through a case study in Ukraine that when facing the situation with Russia and the EU, and at the same time finding itself in a staggered international situation, the Ukrainian government implements a

* DOI:10.6166/TJPS.202006_(84).0002
** Adjunct Assistant professor, Center for General Education, Da-Yeh University.
E-mail: cckuang@mail.dyu.edu.tw.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hedging strategy. However, if the big power (Russia) cannot tolerate this and asks for it to choose a side, the small power (Ukraine) can only choose between being pro-Europe or pro-Russia, and the hedging foreign policy strategy cannot continue.

Keywords: Hedging Strategy, Eurasian Economic Union, European Union, Zelensky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